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柏拉图注疏集

刘小枫 甘阳 ● 主编



[阿拉伯]阿威罗伊 ● 著

阿威罗伊论《王制》

Averroes on Plato's Republic

勒纳 (Ralph Lerner) ● 英译

刘舒 ● 译

华夏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柏拉图注疏集

刘小枫 甘阳 ● 主编



阿威罗伊论《王制》

Averroes on Plato's Republic

[阿拉伯]阿威罗伊 | 著

勒纳 (Ralph Lerner) | 英译

刘舒 |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威罗伊论《王制》/(阿拉伯)阿威罗伊著;刘舒译. -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4

(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刘小枫,甘阳主编)

ISBN 978 - 7 - 5080 - 4621 - 1

I . 阿… II . ①阿… ②刘… III . 阿威罗伊(1126 - 1198) - 哲学思想 - 思想评论 IV . B3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6941 号

Averroes on Plato's Republic,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Ralph Lerner,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Copyright©1974 by Cornell University

This edition is a translation authorized by the original publisher.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 - 2007 - 4904

阿威罗伊论《王制》

[阿拉伯]阿威罗伊 著

勒纳 英译

刘舒 译

出版发行: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集惠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三河市万龙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2008年4月北京第1版

2008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880×1230 1/32 开

印 张:5.875

字 数:122千字

定 价:18.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HERMES

在古希腊神话中，赫耳墨斯是宙斯和迈亚的儿子，奥林波斯神们的信使，道路与边界之神，睡眠与梦想之神，死者的向导，演说者、商人、小偷、旅者和牧人的保护神——解释学（Hermeneutic）一词便来自赫耳墨斯（Hermes）之名。

占典教育基金·正则资助项目

缘 起

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本世纪四十年代，汉语学界中的有识之士深感与西学相遇乃汉语思想史无前例的重大事变，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着个人的禀赋和志趣选译西学经典，翻译大家辈出。可以理解的是，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统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经典难免带有相当的随意性。

五十年代后期，新中国政府规范西学经典译业，整编四十年代遗稿，统一制订新的选题计划，几十年来寸累铢积，至八十年代中期形成振裘挈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体系。虽然开牖后学之功万不容没，这套名著体系的设计仍受当时学界的教条主义限制。“思想不外义理和制度两端”（康有为语），涉及义理和制度的西方思想典籍未有译成汉语的，实际未在少数。

八十年代中期，新一代学人感到通盘重新考虑“西学名著”清单的迫切性，创设“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虽然从选译现代西学经典入手，这一学术战略实际基于悉心梳理西学传统流变、逐渐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典籍系统的长远考虑，翻译之举若非因历史偶然而中断，势必向古典西学方向推进。

九十年代以来，西学翻译又蔚成风气，丛书迭出，名目繁多。不过，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选译了多少新兴学科，仍似乎与清末以来汉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竟前业不大相干。晚近十余年来，欧美学界重新翻译和解释古典思想经典成就斐然，汉语学界若仅仅务竞新奇，紧

跟时下“主义”流变以求适时，西学研究终不免以支庶续大统。

西方思想经典即便都译成了汉语，不等于汉语学界有了解读能力。西学典籍的汉译历史虽然仅仅百年，积累已经不菲，学界的读解似乎仍然在吃夹生饭——甚至吃生米，消化不了。翻译西方学界诠释西学经典的论著，充分利用西方学界整理旧故的稳妥成就，於庚续清末以来学界理解西方思想传统的未尽之业意义重大。译界并非不热心翻译西方学界的研究论著，甚至不乏庞大译丛之举。显而易见的是，这类翻译的选题基本上停留在通史或评传阶段，未能向有解释深度的细读方面迈进。设计这套“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旨在推进学界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选题除顾及诸多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包括一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尤其注重选择思想大家和笃行纯学的思想史家对经典的解读。

编、译者深感汉语思想与西学接榫的历史重负含义深远，亦知译业安有不百年积之而可一朝有成。

刘小枫

2000年10月于北京

《柏拉图注疏集》出版说明

《柏拉图九卷集》是有记载的柏拉图全集最早的编辑体例，相传由亚历山大时期的语文学家、皇帝的政治顾问忒拉绪洛斯（Θεράσυλλος）编订，按古希腊悲剧的演出结构方式将柏拉图所有作品编成九卷，每卷四部（对话作品 35 篇，书简集 1 种，共 36 部）。1513 年，意大利出版家 Aldus 出版柏拉图全集，史称西方近代印制柏拉图全集的开端，遵循的仍是忒拉绪洛斯的体例。

后来，欧洲学界兴起疑古风，这个体例中的好些作品被判为伪作。随后，现代的所谓“全集”编本迭出，有 31 篇本或 28 篇本，甚至 24 篇本，作品前后顺序编排也见仁见智。

俱往矣！古典学界约在大半个世纪前已开始认识到，怀疑古人得不偿失，不如依从古人受益良多。回到古传的柏拉图“全集”体例在古典学界几乎已成共识（Les Belles Lettres 自上世纪 20 年代陆续出版的希法对照笺注本 *Platon Œuvres complètes* 以及 Erich Loewenthal 在上世纪 40 年代编成的德译《柏拉图全集》均为 36 种 + 托名作品 7 种），当今权威的《柏拉图全集》英译本（John M. Cooper 主编，*Plato, Complete Work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84，不断重印）即完全依照“九卷集”体例（附托名作品）。

“盛世必修典”——或者说，太平盛世得乘机抓紧时日修典。对于推进当今中国学术来说，修典的历史使命当不仅是续修中国古代典籍，同时得编修古代西方典籍。中山大学比较宗教研究所属内的古典学研究中心拟定计划，推动修译西方古代经典这一学术大业。我们主张，修译西典当秉承我国清代学人编修古代经典的精神和方法——精神即：敬重古代经典，并不以为今人对世事

人生的见识比古人高明；方法即：翻译时从名家注疏入手掌握文本，考究版本，广采前人注疏成果。

《柏拉图注疏集》将提供足本汉译《柏拉图全集》四十三篇（36篇+托名作品7篇），篇序从忒拉绪洛斯的“九卷集”。尽管参与翻译的译者都修习过古希腊文，我们主张，翻译柏拉图作品等古典要籍，当采注经式译法（即凭靠西方古典学者的笺注和义疏本迻译），而非所谓“直接译自古希腊语原文”（如此注疏体《柏拉图全集》在欧美学界亦未见全功，德国古典语文学界于1994年开始着手《柏拉图注疏全集》，体例从忒拉绪洛斯，到2004年为止，仅出版不到8种；Brisson主持的法译注疏体全集，90年代初开工，迄今未完成一半）。

柏拉图作品的义疏汗牛充栋，而且往往篇幅颇大。这个注疏体汉译柏拉图全集以带注疏的柏拉图作品译本为主体，亦收义疏性质的专著或文集。编译者当紧密关注并尽力吸取西方学界的相关成果，不急于求成，务求踏实稳靠，裨益于端正教育风气，重新认识西学传统，促进我国文教事业的发展。

刘小枫 甘阳

2005年元月

中译本说明

“中世纪”（medium aevum）这个我们耳熟却未必能详的历史分期名称，原义指从西罗马帝国灭亡（476 年）到土耳其攻陷东罗马帝国国都君士坦丁堡（1453 年）之间的一千年，两头两尾的标志就显得是蛮族洗劫了文明。我国古代早有“世历三古”的说法：所谓上古、中古、下古，随着代的推移，古人对“中古”的具体所指也在推移，没有固定不变的所指，所谓“前人说三古各别，从所见者言之，故不同”——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主义文士发明“中世纪”这个语词不仅固定有所指，而且带价值评判意味：既然被用来标识古希腊—罗马古典文明时期与当时（十六世纪）复兴古典文化之间的时段，“中世纪”这个名称便等于古典文化的丧失——西方史家大都承认，直到公元 751 年卡洛林王朝建立，各日尔曼王国才开始逐渐尝试与 5 世纪灭亡的罗马帝国建立文明制度上的传承关系。

就在西方重新蛮族化的时期，阿拉伯帝国却在强劲崛起。通常，西方史书对这件文明史上的要事及其与欧洲的关系大都一晃而过，似乎与欧洲文明的发展关系不是太大，实际上，阿

2 阿威罗伊论《王制》

拉伯帝国的崛起和扩张，不仅改变了原西罗马帝国的地缘版图，还为西方世界传承了古希腊的经书——阿拉伯帝国伍麦叶王朝（661—750年=唐龙明一年至唐天宝九年）时期，出现了翻译古希腊各类经书（医术、数学、天象学、哲学）的风气，在随后的阿巴斯王朝时期，哈里发马蒙甚至“在巴格达建立了一个翻译学校，并配备了图书馆和专门的负责机构”，使得翻译古希腊经书“变成了有组织的和受到政府鼓励的事业”。^①这一翻译工程造就了古希腊古典学问与伊斯兰教神学的结合，从九世纪（巴格达）一直延续到十二世纪（西班牙），以至于伊斯兰教学人被称为继罗马人之后的“古希腊文化遗产的第三位继承者”。伊斯兰教的形成本来就有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成分，最初把古希腊经书翻译成阿拉伯文的学人多是基督徒或犹太教徒，因此，希腊古典文明的这一传承线索也可以看做上古末期近东希腊文明的延续。这样看来，西方文明发展路线的轮廓就得重新勾勒，希腊古典文明时期以后的文明传承路线是：亚历山大帝国—古罗马（共和国—帝国）—伊斯兰教帝国—欧洲中世纪晚期—近代古典文艺复兴。

当然，西方的思想史书都会提到，近代西方得以传承古希腊经书，多赖于中古阿拉伯哲人的传承，但显而易见的是，由于迄今为止西方各类思想史书对中世纪的叙述几乎无一例外以基督教欧洲为中心，阿拉伯文明究竟如何传承古希腊和古犹太教的学术，大多语焉不详——比如，我们听说，中古时期涌现

^① 参见路易，《历史上的阿拉伯人》，马肇椿、马贤译，中国社科版1979，页155以下。

出的伊斯兰教哲人中，最为著名的大哲有三位：阿尔－法拉比（al-Fārābī，约870—950）、阿维森纳（Avicenna，980—1037，阿文名伊本·西那 [Ibn Sīnā]）和阿威罗伊（Averroes，1126—1198，阿文名 Ibn Rushd），但他们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却完全不清楚；再有，从阿维森纳到阿威罗伊之间，还有哲人阿维帕斯（Avempace，? —1138，阿文名伊本·巴哲 [Ibn Bājjah 或者 Ibn al-Sā'igh]）、伊本·图斐利（Ibn Tūfayl，? —1185）等——图斐利写过一本书名为《哈义·本·叶格赞的故事》（Hayy ibn Yūqṭhan），讲一个与世隔绝的自然人的故事，我们所熟悉的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其实是对这本书的模仿。^①

与阿尔－法拉比和阿维森纳不同，今人所掌握的阿威罗伊的生平材料少之又少，各类史书说的几乎都一样，而且没多少可说——十九世纪著名的法国学者勒南 [Ernst Renan] 写过一本《阿威罗伊和阿威罗伊主义》（Averroès et l'Averroïsme，Paris 1861），除了可以添加若干新发现的阿威罗伊著作的抄件外，迄今在文献上还没有什么新著超过这本书，以至于可以推测，如今各种思想史书关于阿威罗伊身世的说法，都来自勒南的这

① 参见穆萨威，《阿拉伯哲学》，张文建、王培文译，北京商务版1996；亚当森/泰勒主编的《阿拉伯哲学》开列了从六世纪至十五世纪的阿拉伯哲人名单长达近两页半（北京三联版2006，页 xv—xvii）。阿尔－法拉比的生平，参见程志敏，“柏拉图经学史的残篇”，见阿尔－法拉比，《柏拉图的哲学》，程志敏译，华东师大版2006；阿维森纳的生平，参见王太庆，“伊本·西那的生平和哲学思想”，见伊本·西那，《论灵魂》，王太庆译，北京商务版1963。关于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与图斐利的《哈义·本·叶格赞的故事》的关系，参见施特劳斯，《如何着手研究中世纪哲学》，陈建洪译文，见《经典与解释1：经典与解释的张力》，上海三联版2003。

4 阿威罗伊论《王制》

本书。

阿威罗伊出生在如今地属西班牙的一个伊斯兰教法学家世家，他爷爷和父亲都是当时颇有名望的教法学家，这种“学家”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学者，因为他们同时身为当地的宗教〔=民事〕大法官。阿威罗伊生长在这样的世家，从小研习伊斯兰教法和伊斯兰教神学自不在话下——值得注意的是，在伊斯兰教中的古典学传统影响下，阿威罗伊还研习古希腊传下来的医术、天象术和形而上学，他最早的著作就是关于医术的书。据说，身兼御医和宰相的伊本·图斐利有一次告诉阿威罗伊，哈里发（伊斯兰宗法政体的最高权力者）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阿拉伯语译本缺乏连贯风格很不满，希望有人作疏解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工作。图斐利当然有能力承担此任，但他年事已高，何况还要料理政务……言下之意，他要阿威罗伊接下哈里发指派下来的这一任务。哈里发（相当于皇帝）怎么也会对亚里士多德著作感兴趣？这件事情不仅令今人费解，也让我们好奇……无论如何，1169年（宋乾道五年），人到中年的阿威罗伊被提名为教法大法官，同年，他着手疏解亚里士多德著作，完成了几乎所有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注疏——也许因为成就如此斐然，1184年，阿威罗伊接替图斐利出任御医，但不知什么原因，晚年（1195年）突然失宠，书也受到牵连统统被烧（实用性的书除外），幸好不少当时已经有了希伯来语译本。

阿威罗伊与犹太教中的哲人迈蒙尼德（1135—1204）和基督教中的哲人阿伯拉尔德（1079—1142）是同时代人，但与所有中古伊斯兰教哲人相比，阿威罗伊对西欧哲学思想的影响最为直接、持久，名载史册的影响至少有三次。第一次在十

三世纪：当时，欧洲学术在经院学人的辛勤耕耘下已经重新起步（安瑟伦〔1033—1109〕为代表的早期经院学），尽管如此，西方学者能读到的古希腊和古罗马经典仍然非常有限——12 世纪初期，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拉丁文译本仅有《范畴篇》和《解释篇》，但在随后的短短一百年里，亚里士多德的几乎所有著作都有了从阿拉伯语或希腊文译成拉丁文的译本（1260 年，《政治学》译成拉丁文具有特别的思想史意义）……正如今天我们已经认识到的那样，当时的学人很清楚，仅有原典译本远远不够，前人的注疏对研读原典非常重要，因此，13 世纪上半叶，刚辞世不久的阿威罗伊的亚里士多德注疏受到了基督教经院学人的极大关注，被大举译成拉丁文，从而对中期经院学产生了直接影响。到了十六至十七世纪，也就是西方的古典文艺复兴时代，阿威罗伊的亚里士多德注疏已经演化成“阿威罗伊主义”，而且成为西方学界的显学，影响被及马基雅维里、斯宾诺莎……史称阿威罗伊对西方学术的第二次重大影响。^①

如果说阿威罗伊对西方思想的前两次影响体现为所谓“阿威罗伊主义”的形成和流布，那么，二十世纪中期以来迄今的最近这一次影响则首先在于澄清阿威罗伊与阿威罗伊主义的差异。换言之，处身于伊斯兰教法体制中的阿威罗伊学问与西方经院学者手中的“阿威罗伊主义”不是一回事，脱开这一“主义”来重新认识阿威罗伊学问，对理解整个西方思

① 参见 Harry A. Wolfson, *The Twice - Revealed Averroes*, 见 *Speculum: A Journal of Medieval Studies*, July 1961, No. 3, 页 373 以下；亦参 J. H. Burns 等, 《剑桥中世纪政治思想史》, 12 章, 程志敏、陈敬贤等译, 北京三联版 2008 (即出)。

想史来说，意义迄今还难以估计——至少，在“中世纪”政治哲学史这一名目下，我们看到的已不再是基督教一枝独秀的情形，而是伊斯兰教—犹太教—基督教三枝各呈奇葩。^①

这一次重审阿威罗伊哲学与施特劳斯的研究有关——施特劳斯对阿尔—法拉比的柏拉图义疏的重新阐发，非常著名，很大程度上更改了西方思想史的自我理解。不过，施特劳斯的阿尔—法拉比政治哲学研究与他早年对斯宾诺莎与阿威罗伊主义之关系的研究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十六至十七世纪的“阿威罗伊主义”向来被看做西方基督教学者（甚至犹太教学者）对中古阿拉伯哲学的标准理解，然而，在施特劳斯看来，这种理解却是对中古阿拉伯哲学的极大误解。

以伊斯兰—犹太哲学为一方，基督教经院主义为另一方，双方之间最明显不过的差别在于：在西方世界，政治科学的经典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而在伊斯兰—犹太世界，政治科学的经典则是柏拉图的《王制》和《法义》。事实上，伊斯兰—犹太世界那时全然不知有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而《王制》和《法义》在基督教欧洲的出现不早于十五世纪。^②

巴格达的阿巴斯王朝传承古希腊和犹太教学术时，便一并接纳了亚里士多德著作，但奇怪的是，中古伊斯兰教中的大哲选择了发展柏拉图的政治哲学，而非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

① 参见 Ralph Lerner / Muhsin Mahdi 编，*Medieval political Philosophy*，Cornell Uni. Press 1972；这部文选改变了过去的西方中古政治思想史版图，选伊斯兰教政治哲学文选十篇，犹太教政治哲学文选五篇，基督教政治哲学文选十篇。

② 施特劳斯，《如何着手研究中世纪哲学》，前揭，页317。

——《政治学》很可能好长时期一直没有译成阿拉伯语，相反，到10世纪时，柏拉图的《蒂迈欧》、《王制》和《法义》已经有了阿拉伯语译本。从这一“奇怪的现象”入手，施特劳斯经过深入考察发现，就纯哲学方面而言，中古伊斯兰教—犹太教—基督教三大教派中的哲人凭靠的都是同样的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传统，但在道德—政治哲学方面，中古伊斯兰教—犹太教中的哲人与中古基督教哲人则有根本上的不同。^①

这种差异的意义何在？恰恰在解释这一差异时，施特劳斯说到了阿威罗伊与阿威罗伊主义的差别：

基督教经院主义受伊斯兰哲学影响最深的一个学派是拉丁阿威罗伊主义（Latin 通 Averroism）。拉丁阿威罗伊主义闻名于世的是其双重真理学说，即认为一个命题可以在哲学里为真而在神学里为假，反之亦然。在阿威罗伊本人或其前辈们当中，并无双重真理的学说。我们倒是发现，伊斯兰哲学里相对充分地讨论了两种教诲的区别，即根据修辞论辩的显白教诲与根据说理论证或科学论辩的隐晦教诲之间的区别。至今，伊斯兰哲学的学徒还没有充分重视这个区别，而它显然是绝对地无比重要。（同上，页319）

① 施特劳斯在1937年发表的英文论文《论阿布拉瓦内的哲学倾向与政治教诲》中说：“《政治学》没有被译成阿拉伯文，很可能不是出于纯粹的偶然，而是在中世纪一开始就精心选择的结果”。见施特劳斯，《犹太教哲学与苏格拉底问题》，刘小枫编，余慧元等译，李致远校，北京华夏版2008。

施特劳斯在这里明确把“阿威罗伊本人或其前辈们”与“拉丁阿威罗伊主义”区别开来——言下之意，就中古伊斯兰哲学对基督教西方的影响而言，通常注意的是阿威罗伊的亚里士多德注疏对西方中古中、晚期和近代思想的影响，但实际上，阿威罗伊对柏拉图的注疏同样值得注意。

这样来看的话，《阿威罗伊论〈王制〉》中译本的问世不是一桩小事，毕竟，西方的权威史书最近还说：“中世纪没有一篇文献谈到柏拉图《王制》的性质”（参见 J. H. Burns 等，《剑桥中世纪政治思想史》，前揭）。热心的读者一定会问：这部《阿威罗伊论〈王制〉》是从阿拉伯文翻译的吗？遗憾的是，阿拉伯文原本早已散佚，仅有希伯莱文译本和拉丁语译本，尽管我们的译者是北大阿拉伯语专业毕业的高材生，我们这个译本仍然依据的是 Lerner 教授的英译本，理由在于，这个英译本基于精良的校勘并下了精审的注释——不消说，如今我们翻译西典，是否能够吸纳西方学者的最新校勘和注疏成果，已成为衡量我们的译业的基本标准之一。

刘小枫

2008 年 3 月于沐猴而冠斋